

面向解放的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

殷之光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秩序观的物质基础。19世纪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推动欧洲思想家开始在全球尺度上对秩序问题进行整体性和普遍性的思考,在这个进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三种思想脉络。其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认识动态秩序的方法,将秩序看作不同行为体在不同尺度的共同体内通过集体运动而投射出的规律。这种集体运动改造着人类所在的物质世界,同时经由人类活动而改造了的物质世界反过来又为新一代人类的活动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这种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连续堆叠构成了秩序的又一种特质,即自然世界与人的社会生活历史性的交织。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其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剥离导致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断裂,并使“全球南方”等整体性概念难以被充分理解。由于孤立运用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理论传统,既有研究难以系统理论化中国的秩序观。唯物辩证法不仅提供了彻底的整体主义认识论,还为阐释现代中国秩序观奠定了普遍性理论基础。中国的政治实践不仅继承了这一认识论,更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中提供了推动理论发展新的可能。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秩序;“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科学主义

【作者简介】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5) 05-0003-3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干涉与反干涉’视角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03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导言：秩序思考的辩证法路径

今天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什么？中国描述自身的国际秩序理想与实践应当依据什么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种认识论的普遍性基础在哪里？如何与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进行对话？讨论这一系列问题，必然需要处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复杂性关系。沿着时间维度展开，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秩序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是否具有连续性与一致性；沿着空间维度，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则变成了秩序的扩散以及空间尺度对秩序复杂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影响。我们通常还会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区分开来，并尝试通过寻找两者之间的共振关系来建立某种更具普遍性的统一理论。此外，人们在复杂体系中对规律的探索自然附带了一种目的论诉求，即希望在看似无序的复杂体系中寻找可供参考与遵循的确定性原则。这也在根本上突显了一切认识论探索中难以回避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承认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必然性，由此成为我们对秩序问题讨论的起点。

运动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性规律。在时间维度上，无休止的复杂运动成为秩序思考面临的首要障碍。形式逻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复杂运动的一种方法，即将世界理解为一个静态时刻的叠加，并且通过对静态时刻进一步细分，以原子论为方法，以不同基本单位为基准，将每一个静态“切片”拆分为诸多基本单位构成的规律结构。接下来比对每一个静态时刻中结构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确立常量与变量，并尝试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通过形式逻辑的归纳与演绎法推导出规律的普遍性。对结构及其规律的探索也蕴含了对稳定性的预设，对秩序的研究随之也就局限于对稳定性现象的分析上。

形式逻辑在讨论秩序问题时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它预设了一个超越性的观察者本体以及一种不受人类能动影响的“客观”规律。观察者本体居于经验世界之外。经验世界中的规律可以在对原子化的、静态的事件或历史截面的精细分析中显现，并且这种规律必然使系统趋向稳定。然而，在多大程度上那些基于“规律”构成的“秩序”是自然的而非社会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观察者“意志”的干涉？秩序是否真正趋于稳定？上述问题的提出触碰了形式逻辑的边界。当面对自然与社会、理性与意志、客观与主观等二分范畴之间模糊的边界时，辩证法逻辑提供了认识论革命的可能。在这些二分范畴之外，辩证法采用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将思

考集中到对复杂关系、运动尤其是体系运动中累积性量变向革命性质变的转化等问题上。这也为思考秩序特别是秩序的创生与兴衰这种时空尺度中的宏大理论问题提供了认识论上的立足点。

对什么是秩序的理论讨论往往出现于历史的重大变动时代，且具有推动理论与实践革新乃至范式革命的潜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中不乏对于国际秩序问题的讨论，这种宏大的理论兴趣往往与经验世界中影响深远的时代性变迁紧密相连，由时代变迁而促生的宏大理论问题又进一步构筑了一定时期内科学研究的基本认识论与方法论范式。根据谷歌 Ngram viewer 的简单统计，我们就能较清晰地看到对秩序的知识兴趣与关键历史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经济危机、冷战结束以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这几个时间段上对秩序问题的讨论都有显著增加（如图 1）。实际上，秩序的理论化即知识生产的内部演进，是现实对理论的推动，也是理论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这就形成了不同理论之间、不同实践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纠缠共振。将这种纠缠共振“状态”作为研究对象，而非单纯追求理解不同主体的“本质”，更加有助于我们把握作为动态的秩序发展与演变。具体来说，将这种理论兴趣——或是以某些特定群体用某种语言写作并发表作品的绝对增量——视为一种思想史现象，我们可以展开知识社会学与思想史的考察，即这种共同兴趣如何产生、何时产生、为何产生、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由谁共享、如何传播以及面对谁传播，这些共同兴趣背后是否存在认识论的基本共识，这些都是知识社会学与思想史考察能够处理的基本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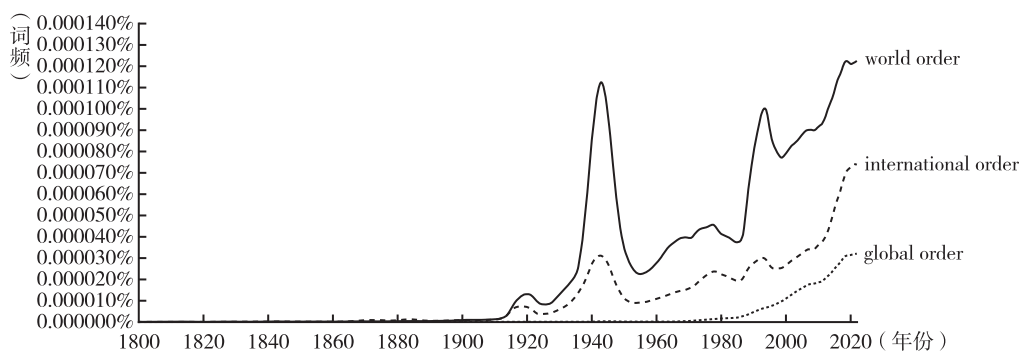


图 1 谷歌 Ngram 对 world order (世界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 (国际秩序)、global order (全球秩序) 三个词组的词频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谷歌 Ngram viewer 检索结果制作。

空间的尺度是秩序讨论的又一前提，空间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展开提供了基本场所。人在多大尺度上展开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受到了多大尺度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影响是我们思考空间问题的基础。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集体组织的形式、建立的用以管理这种社会关系的种种结构则为我们对秩序的抽象讨论提供了抓手。国际、全球与世界是本文将会触及的秩序尺度。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学者提供了一种三者关系的定义：国际秩序强调秩序的主体是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组成了多元和有限的社会，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架构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定义中，世界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物质存在，由主权国家组成。^①而全球反映了在国家之上和之外的另一种主体性视角。这种视角强调不能仅仅从国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秩序，而需要将跨国和跨政府的复杂网络纳入秩序思考的整体框架。^②这种定义的局限在于，它虽然指出了国际秩序中由于主权国家实力差异而产生的霸权结构，^③但并未给出任何能够改变这种实质不平等的路径，而仅仅从抽象的层面上将全球秩序作为替代性方案，试图构建一个超越国家、由个体和公私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全球治理乌托邦。^④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提供一个替代性构想。在本文中，全球被视作一种物质的空间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类社会活动所能触及的基本尺度。世界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Weltmarkt）”这一意义上被使用。它强调，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能触及的共同体规模越来越大，并最终扩展到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则将人在更大尺度上连接和组织了起来。这种超大规模空间中组成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语境中的“世界市场”。

世界市场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等社会性活动在全球尺度上被组成了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国际”这一概念，突出强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主体性位置。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现代国际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却始终在一种结构性权力的影响之下运转。^⑤国家迄今仍是构成这种结构性权力的重要主体。“国际”虽然在概念上假

① 安德鲁·赫里尔著，林曦译：《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② 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第6—7页。

③ 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第39页。

④ 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第111—132页。

⑤ 最著名的例子是苏珊·斯特兰奇采用“结构性权力”来批判“实力即权力”的一元化权力观。参见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2nd edition)*, Continuum, 1994, pp. 24–32.

定了国家的主体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中仅包含国家一种主体。拥有结构性权力的不仅仅是极少数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通过依附理论的分析,少数跨国公司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的细胞”也拥有同样的权力地位。^①

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以“秩序观”为研究对象,以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和20世纪晚期三个关键历史时段为背景,分别厘清实证主义、英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基础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时空语境。本文并非对上述三种理论传统的学术史梳理,而是希望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上述理论路径基本观念背后的认识论局限。下文将宏观地区分人类秩序观认识的两种认识论传统,并具体呈现在系统性消除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后不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秩序的认识及其理论局限,最后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在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秩序构想中的呈现与发展。

二、秩序：一种人的时空辩证法

(一) 秩序的霍布斯式理解

对于秩序这类宏大理论命题的理论兴趣本质上反映了一种探索人对自身、自然界以及他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元问题。1790年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中用“世界观(Weltanschauung)”来描述这种对秩序问题的总体性认知。^②至19世纪30年代,“世界观”已成为西方各种语言中广为应用的概念。^③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秩序的认知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前者体现了秩序的自然哲学内涵,强调对其内在客观规律、行为主体和结构等的认知与发现;后者则反映了秩序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命题,反映了世界观与人的能动性的结合,并强调了对秩序的认知在“改造世界”时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起点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带来的物质性全球化的基础上,并将其不平等的结构视为某种具有自然法性质的前提。既有理论认

^①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4—74页。

^②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ol. V, *Akademie Ausgabe von Immanuel Kants*,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2, S. 6.

^③ Albert M. Wolters, “On the Idea of Worldview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in Paul A. Marshall, Sander Griffioen and Richard J. Mouw, eds., *Stained Glass: Worldview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p. 14–25.

为，随着16世纪欧洲殖民扩张进程的展开，世界不同地区原有的各种国际体系逐渐消亡并被欧洲的国际秩序所替代。^①虽然后来的研究者采用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等概念工具引入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尽可能地将制度扩散过程描述得更加复杂，并尝试建构非西方世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②但是，这些理论尝试都没有否定当代国际秩序形成于西方并在向世界扩散过程中不断演化的基本认识。

将世界秩序的形成视为欧洲秩序观的全球扩散还体现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公理性假说上。我们不妨将这种秩序观称作霍布斯式秩序，它假定最高主权者的出现创造了秩序，这种秩序的延续性建立在层级分明的结构基础上，决定这种等级结构的根本理由是自然法原则。例如，人们会将大国作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主体，讨论大国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塑造作用或权力在大国之间的转移。在此基础上，世界尺度上的无政府状态便被等同于共同权力缺位后每个人针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认识下，和平是无政府状态的反题，即和平是“秩序”的状态，其反面则是恐怖的“无序”。当无政府状态被等同于无序时，秩序的建立便自然被等同于政府或主权者的建立。在西方政治哲学叙事中，对这一秩序观最经典的表述便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比喻。国际层面上共同权力的缺位造就了独立的最高主权者之间互相猜忌，“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形成了没有法律、是非以及公正观念的恐怖情形，^③而人们希望避免这种恐怖状态的本能为国际层面上最高主权者的诞生奠定了最根本的自然法基础。无论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有关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必须有一个最高霸权者的认识，还是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对美国作为“自由利维坦”的赞誉，实际上都是这种利维坦秩序观的当代逻辑衍生。^④

① Adam Watso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Expansion,”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3-32.

②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s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39-275; Antje Wiener, “Enacting Meaning-in-Use: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1, 2009, pp. 175-193; Mona Lena Krook and Jacqui True, “Rethinking the Life Cyc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2010, pp. 103-127; Carla Winston, “Norm Structure, Diffusion, and Evolu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3, 2017, pp. 638-661.

③ 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96页。

④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396—397页；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然而，霍布斯式秩序假定的层级结构显然不能被视为人类共同体组织的唯一模式。尤其是在对国际秩序的讨论中，非但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本身会在长时段的运动中发生变化甚至消亡，而且构成国际格局的诸多结构、位置和实力等因素也处于持续运动中。秩序更像是在复杂系统中不同主体在不断运动中投射出的宏观状态。而与自然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社会的运动既内在于自然世界，又受人的能动性影响。因此，人类社会的运动无法被真正等同于任何一种自然界中封闭的平衡系统。人类社会在不断谋求稳定的熵减过程与谋求变革的熵增过程中实现着历史性运动。只要结构性不平等仍然存在，这种运动就一定会受不同主体在结构中“位置性”差异的影响。体现在历史中，就是处于体系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的主体会更趋向于离开自身位置，处于中心的主体则更趋向于维持既有结构。

（二）秩序作为人的运动进程的客观投射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秩序的构成视为一个多方合力的运动进程。这种合力既包含了引领性力量的推动力，也包含了其他由对抗或疑虑而产生的阻力与摩擦力以及由互助、共生、协作等产生的复杂力量交织。世界市场是这种合力作用得以产生的基本物质前提。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国家观扩展到对国际社会秩序诞生问题的理解上，那么国际秩序便不是一种超脱于国际社会的强制力量，而是在行为者的有机互动中自然形成并分化出来的公共社会权力。^①同时，这种运动的理想方向即使系统真正趋于稳定的状态必须是一种不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与位置性差异的自由状态，即马克思所构想的以“社会解放”为目标的“社会共和国”秩序在世界市场层面上的延伸。^②

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和国理想秩序的普遍性基础无疑也来自自然法。然而，与霍布斯式秩序观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秩序观将人的能动性作为自然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受自然主宰的对象。因此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对秩序问题的讨论便是一种探索世界自然与社会存在的系统性、整体性逻辑的宏大理论。在方法论上，这种讨论需要以“人本身”——即马克思所说的与社会和自然界发生密切关系的“现实的人”——为起点。^③这种“现实的人”在空间与时间中的活动将“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连接为一个“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这

① 有关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观念及其在马克思国家理论中体现更翔实的讨论，参见汪仕凯：《从现代国家到社会共和国：卡尔·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第26—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③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这个过程可以被视为有机的辩证过程。^① 在这里，自然的辩证强调了作为集体的人类活动受地理与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而集体的人又通过其活动不断形塑着自然条件。历史的辩证则展现了在这种自然辩证中人们建设不同规模与不同作用的共同体的进程。这个进程既包含了共时性活动，也包含了历时性活动。在这个进程中，不同共同体内部、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与自然之间也在不断相互作用。与此同时，精神世界的维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入了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整体分析，并与上述自然与历史的复杂辩证产生了合力，表现在人类历史中，就是一个又一个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关键历史结果。^② 本文关注的国际秩序便属于这些历史结果。

如果抽离了“人”的主体性位置，那么我们对于秩序的讨论就会出现逻辑断裂。仅遵循描述性的方式，对秩序的讨论就会被还原成一种决定论。它会将人作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物，其行为受制于生物学或数学规律。这种决定论在19世纪末的欧洲作为一种帝国知识获得了极大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说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类知识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科学为名，将本种族/本国的扩张或霸权位置以及被殖民地的不发达解释为一种客观必然的自然发展结果，^③ 而在决定论影响下的世界秩序便成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④ 无论是自然还是在自然中存在的人都成为自我的客体，受制于从宇宙形成之初便已确定的自然法则。但如果将规范性作为世界观的全部，则无疑取消了思想形成背后的客观原因，将人与世界的复杂联系消解为一种唯心主义式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⑤ 人类建立起来的世界认识、秩序观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随之变成可以被任意解构或发挥的主观幻想，由此形成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③ 关于科学作为一种“帝国理由”的讨论，参见Richard H. Grove, *Ecology, Climate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7; 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arah Irving,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ickering & Chatto, 2008。关于以环境决定论来解释被殖民地不发达状态的思想史梳理，参见Michael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20, No. 1, 1994, pp. 3-21; Alan R. H. Bake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2-108; Robin A. Bullin, *Geographies of Empire: European Empires and Colonies c. 188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96-451。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3页。

（三）人作为整体性哲学讨论秩序的起点

今天的世界秩序本身以及我们思考世界秩序的方法毫无疑问与19世纪欧洲的思想史发展有着深刻联系。在物质层面上，当今世界在客观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世界性”的产生是飞机、轮船、铁路、化石燃料、电力以及通信等诸多现代技术发展的结果，而这些技术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欧洲启蒙之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历史浪潮中。这种物质层面的联系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又反过来促成了“精神的生产”的世界性。^①采用“科学化”范式来分析并规制人类社会/政治行动的信念、探索整体性与系统性哲学的理想则无疑是这种世界性历史进程的反映。这种深受19世纪欧洲科学发展影响的哲学尝试寻找统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理论规律，其背后的认识论体现了19世纪以来欧洲尤其是英国、德国与法国的功利主义哲学、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综合影响。^②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整体性哲学。然而，在20世纪中后期欧美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及其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却被有意识地剥离。其结果之一便是西方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发展开始重新朝向唯心/唯物二分方向的变化。在这个思想浪潮中，宏大理论向唯心方向的变化体现为对普遍性的彻底否定。人类的历史被分解为无数个原子化、相对主义式、非历史性与无意义的细碎行动。这一趋势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典型的表达形式是批判国际关系理论（critical IR theory）与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路径。宏大理论向机械唯物论方向的变化则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等方法的推崇。这种思潮充斥着19世纪决定论的色彩。在其影响下，人们对宏大理论本身的探索被对科学解释能力的坚信所替代。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尤为突出地表现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偏信。

三、物质与精神的二分：“美国社会科学”的 孔德主义认识论前提

（一）19世纪欧洲全球扩张中产生的机械唯物论秩序观

在当下的社会科学讨论中，实证主义几乎被视为孔德式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同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4页。

^② David Thoms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F. H. Hins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 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01-119.

词。当国际关系研究被批评作为一种“美国社会科学”时，人们在认识论层面上强调的实际上就是科学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地位。^① 国际关系学者更倾向于将这种认识论霸权视为美国全球政治霸权的文化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将思想的变迁碎片化，切断了“美国社会科学”与欧洲启蒙主义以来尤其是 19 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全球扩张进程影响下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这种批判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作为 19 世纪世界市场加速发展时代的另一种认识论，实际上通过辩证逻辑提供了更彻底的实证理论框架。

随着欧洲在全球扩张的现实需求的驱动，19 世纪欧洲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发展开始产生一种宏大的整体论热情。这在思想上表现为希望找到一种统一的理论整合自然与道德秩序，并以此作为普遍理论基础将世界在更大尺度上组织起来。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其表述为：“既然依靠由计算得出的最终结果建立起来的一套管理方法已经控制了个人，那么只消把这套方法应用于社会就行了。”^② 这种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主义认识论自认为调和了作为自然生物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之间的矛盾，用社会科学弥补了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鸿沟。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物理学与政治》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等的《社会的科学》等在欧美国家极具学术与政治影响力的作品，也都无一例外地遵循了这套认识论。^③

实际上，当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最早创造“宏大理论”这个概念时，就是用来指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这种极具科学主义色彩的社会学理论。米尔斯批评道，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论（abstracted empiricism）”两种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研究范式忽略了历史的丰富性以及历史变迁脉络在社会分析中的作用。^④ 米尔斯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美国社会学界得到了一定发展，并产生了历史社会学这一同量化社会学分庭抗礼的范式。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从来都应当是以历史及其取向为

^① 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3, 1977, pp. 41–60.

^② 赫伯特·斯宾塞著，张雄武译：《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1 页。

^③ 参见 Walt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or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Inheritance’ to Political Society*, Henry S. King & Co., 1872; William Graham Sumner, et al., *The Science of Society: Volume 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1928; 约翰·西奥多·梅尔茨著，周昌忠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65—68 页。

^④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基础的学科，其诞生与资本主义商业化与工业化时代的物质发展以及政治文化变迁密不可分。^①

（二）新康德主义对时间维度的调和

如何将历史这一时间维度纳入社会科学的分析？历史社会学的常用方法仍旧回归了19世纪的科学主义传统，以约翰·穆勒（John S. Mill）提供的比较逻辑作为根基，将不同历史事件作为样本，观察它们产生的类似历史结果并尝试给出导致其结果的诸多原因，同时面对结果不同的历史样本来探索导致其差异的根本因素。当然，无论是求同法还是求异法，两种方法论的核心都体现了科学主义对因果关联律的忠实热情以及对原子论世界观假定根深蒂固的认同。

对时间维度的另一种吸收来自19世纪末威尔海姆·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与威尔海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者所推崇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在这里，历史经验被作为关注个别对象、特殊性、精神性和文化性的抓手，与强调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natur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形成了“不可通约的”二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与人文社会科学即字面意思上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之间永恒的张力。^② 这种“历史主义”路径的发展也为现象学与解释学等20世纪哲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并直接为当今西方自由主义右翼的再度崛起提供了精神养料——他们通过新康德主义找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特殊性。^③ 而在同

^① Theda Skocpol, “Sociology’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1.

^② Wilhelm Windelband,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erlag von J. C. B. Mohr/Paul Siebeck, 1921, S. 548.

^③ 19世纪末欧洲的新康德主义者认为，欧洲当时从科学主义视角对社会秩序的认识否定了精神与道德的积极价值。他们强调，人类社会的秩序必须建立在对“善的威力的信仰”和“实现正义事业的期望”的基础上。关于这段思想史尤其是新康德主义对机械唯物论的批判，参见梅林著，吉洪译：《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15页。康德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声张及其自由共和主义秩序观对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国际秩序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强调原子化的个人自由权利以及强调群体共识的自由共和主义观念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这构成了自由主义与近些年硅谷精英中的自由意志主义秩序观的主要冲突。关于康德自由共和主义观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参见 Matthew Lindauer, “Kantian Themes i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rent J. Steele and Eric A. Heinze,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2018, pp. 30–42。关于从自由意志主义者角度对康德的阐释，参见 Jason Kuznicki, *Technology and the End of Authority: What Is Government for?* Palgrave Macmillan, 2017。关于个人意志主义者将个人经验、个人历史和个人意志作为超越制度性霸权唯一途径的阐释以及他们对自身作为“世界主义者”身份的构建，参见 Anthony Comegna,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Utopianism,” in Aaron Ross Powell and Paul Matzko, eds., *Visions of Liberty*, Cato Institute, 2020, pp. 319–328。个人意志主义者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政策影响颇大，他们的崛起也标志着帝国主义进入了新阶段。

样的认识论基础上，西方自由主义左翼理论则为“非西方”精神找到了一席之地，^①这也为一些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提供了空间。但在思想根源上，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左右翼之间的论争还是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都延续着孔德式科学主义的认识论传统。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认识论，孔德称其社会学为“实证的科学哲学（positive scientific philosophy）”，并从19世纪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取思想资源，将人类活动称为“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的运动。^②孔德将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研究“秩序”，称为社会静力学研究；另一类关注“社会发展（social progress）”，称为社会动力学研究。^③孔德的宏大理论是对大革命与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社会大变局的回应。^④他希望通过实证性研究，发现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条件，并以此结束那种社会动荡与“思想无政府（intellectual anarchy）”状态。虽然孔德承认“良知的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在打破旧制度的统治时具有重要作用，但在社会重组谋求稳定共识时则必须被放弃。孔德构想的社会秩序以稳定为理想状态，并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作为这种稳定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孔德援引了天主教的“思想共同体（communality of ideas）”概念，强调社会所有成员在精神上构成一个思想共同体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对实证主义的笃信则是这一思想共同体的核心。^⑤

由孔德开创的实证社会科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并于20世纪初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得到了长足发展。^⑥此外，帕森斯对“社会系统”的经典论述还充分得益于他同芝加哥大学诸多生物学家与心

① 关于西方自由主义左翼、后殖民学者和批判理论学者从文化相对主义角度出发对非西方精神和历史经验的本质化理解，参见戴维·布莱尼·纳伊姆·伊纳亚图拉：《自下的国际关系》，载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等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25—738页。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将历史经验还原为相互不关联的事件并进而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霸权结构的讨论，参见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李滨等译：《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4—255页。

② Auguste Comt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Vol. 2, Longmans, Greens, and Co., 1875, pp. 239–242.

③ Auguste Comt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Vol. 2, p. 1.

④ Thomas J. Bernard, *The Consensus–Conflict Debate: Form and Content in Social The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90.

⑤ Auguste Comt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Vol. 2, pp. 153–155.

⑥ Victor Lidz and Helmut Staubmann, “Parsons and Politic, Introductory Remark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52, No. 1, 2021, pp. 12–18.

理学家对控制过程 (cybernetic process) 和系统论的讨论。^① 帕森斯明确采用了孔德与涂尔干的基本认识, 将自然界生物活动与人类社会活动相类比。他强调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在与环境系统“交互 (interchange)”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 他将此种现象称为“互嵌 (interpenetration)”。在这种互嵌状态下, 当某些现象开始持续稳定且有规律地出现时, 帕森斯便将其视为一种结构, 产生这种结构的社会与环境的交互则成为一种可供分析的系统。^② 对于系统的研究因此就变成对这些现象之间相关性的分析以及对一系列现象的统计学研究。这种包含了研究方法论的整体性哲学迅速在美国发扬光大, 并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 其中就包括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国际政治研究。^③ 接下来, 受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实证研究影响的国际政治研究通过美国学者的普遍化理论抽象与方法论总结, 加上美国学界在学术期刊、评审机制和教育能力等方面的强势地位, 使一种以“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为基底的国际政治科学很快开始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④ 这种实证主义也经由美国的现实政治诉求被不断加强。^⑤ 现实的需求使得以社会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 (pragmatism) 为认识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及现代化理论急速走上了实证研究的道路, 这场被研究者称为“行为主义革命”的思想史现象深刻影响了当今的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研究。^⑥

孔德式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依赖以原子论为基础的世界观, 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 对分析单位进行了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化的定义, 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对个体以及个体间关系的研究。形式逻辑是这种认识论依赖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影响下, 国际关系的研究被简化成对个人、国家或次

① Bernard Barber, “Talcott Parsons on the Social System: An Essay in Clarification and Elabor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2, No. 1, 1994, pp. 101-105.

② Talcott 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alcott Parsons, et al., eds., *Theories of Society*, The Free Press, 1961, p. 36.

③ Stephen M. Saideman, “The Apparent Decline of the IR Paradigms: Examining Patterns of Publications, Perceptions, and Cit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 4, 2018, pp. 685-703.

④ 鲁鹏、尼古拉斯·奥努夫:《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之路》,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1—122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人文与科学的契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0—82页。

⑤ 有研究者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21世纪初“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是推动美国国际关系实证研究的两次关键事件。参见Ido Oren,“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R Theor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4, 2016, pp. 575-576。

⑥ 倪世雄、蔡翠红:《西方国际体系论探索——从科学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第17—24页;李泉:《“行为主义国际关系”中的“沃克学派”及其未来改进方向》,载《世界政治研究》,2022年第2辑,第21—47页。

国家行为体理性选择/非理性行为背后潜在的贝叶斯规律的研究。^①在此基础上,人类的政治活动便可以被转化成一种行为体之间或行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将每一次互动都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来看待,那么人类对世界这一复杂系统的认识则变成了对无数事件堆叠(aggregation)背后出现的某种规律或现象的认知。^②这种具有浓厚机械决定论色彩的认识论仍旧延续了一种孔德式的理论追求,即希望用科学理性取代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以自然科学为标准重新理解人类精神与道德活动。

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之前,国际关系学者还对这种方法论抱有极大希望,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完善模型以求能够消除信息不完整而带来的不确定性,或是尝试创造一种更精巧的计算模型以求能够彻底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推动这种实证研究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大学,更重要的力量是兰德公司等战略咨询公司。由美国军方在战争需要下推动成立的兰德公司将不同学科的理论发展与美国国家战略的实际需求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受美国全球战略需求推动的研究路径明确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自上而下的决策需求为目的。^③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定量分析更是提出了以模拟为基础的“稳健决策法(robust decision making)”。^④稳健决策法以决策分析为目标的研究利用大模型与算力堆积,通过对复杂场景的模拟积累数据,并以此为统计基础对未来进行预测。对系统稳健性(robustness)的分析受统计学与博弈论发展的影响,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面对的深层不确定性视为多种复杂变量机械互动产生的结果。^⑤这一点与传统基于贝叶斯优化的决策分析并无差别,^⑥不同之处在于稳健决策法希望决策者避免仅仅依靠理论假定与逻辑推理进行预测,用计算机模拟来穷举可能发生的场

① Andrew H. Kyd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Rational Choic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25-443.

② Uri Wilensky and William Rand, *An Introduction to Agent-Based Modeling: Modeling Natural, Social, and Engineered Complex Systems with NetLogo*, The MIT Press, 2015, pp. 1-3.

③ Alex Abella, *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Harcourt, 2008.

④ Robert J. Lempert, et al., “Making Good Decisions Without Predictions: Robust Decision Making for Plann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 RAND Research Highlights, February 28, 2013.

⑤ Jonathan Rosenhead, Martin Elton and Shiv K. Gupta, “Robustness and Optimality as Criteria for Strategic Decisions,” *Oper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3, No. 4, 1972, pp. 413-431; Bert Metz, et al., ed., *Climate Change 2001: Mitig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⑥ Millett Granger Morgan and Max Henrion, *Uncertainty: A Guide to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in Quantitative Risk and Policy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景，依靠算力打开贝叶斯优化中的不确定性黑箱，选出一个最优解。^①这更符合实证主义的根本认识。传统决策分析与稳健决策法处理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体系规模与时间尺度上的有限性。例如，在处理工业生产流程优化、短期特定市场趋势、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特定政策效力分析和专门系统（如天气、消费者意图、群体行为）中的复杂运动与组织行为等中观与微观问题时，这类决策分析的效果极为显著。^②

尽管这种思潮沿袭了19世纪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却彻底淡化了驱动19世纪科学主义产生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寻找融合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甚至历史哲学的整体性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确定性权威，它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是将孔德构想的理想社会状态付诸实践的结果。这种理想状态建立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结构上，将科学家视为全知全能的宗教祭司，确保这种不平等但“和谐”的社会秩序能够持续保持稳定。然而，将这种理想秩序扩展到全球之后，不平等的预设以及对“现实的人”主体性的忽略会成为这种理想结构的内在弊病。具体来看，这种认识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变革何以成为可能。正如孔德无法真正解释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何以产生一样，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也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化为何能够实现、西方经济危机为何会与右翼反全球化力量崛起几乎同时发生等问题。中国的发展以及西方右翼崛起等现象由此在方法上始终被处理成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

四、秩序的目的论理解：英国学派与作为 秩序前提的立法者目的

（一）理论与经验的割裂

在接受物质与精神的二分后，由科学主义确立的理论便获得了超过实践这类经验性原则的知识地位，在面对经验世界出现的种种超出既有理论解释能力的现实时更倾向于限制甚至否定经验。秩序被看作理论抽象的产物，具有穿透时空的普遍性。

^① Robert J. Lempert, et al., "A General, Analytic Method for Generating Robust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Scenarios," *Management Science*, Vol. 52, No. 4, 2006, pp. 514-528; David G. Groves and Robert J. Lempert, "A New Analytic Method for Finding Policy-Relevant Scenario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17, No. 1, 2007, pp. 73-85.

^② Robert J. Lempert and David G. Groves, "Identifying and Evaluating Robust Adaptive Policy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for Water Management Agencies in the American Wes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77, No. 6, 2010, pp. 960-974.

因此，当下在西方世界经常出现的一种偏见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其“破坏”或“挑战”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由于其采取了种种“不道德的手段”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因而在中国实现发展目标后，必然且只能重复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老路，以这种形式参与国际秩序的制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机械决定论将秩序等同于某种自然法或某种制度与机构的同义词，客观上限制了理论本身的发展。21世纪初，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沉浸在胜利主义的热情中时，西方学者在不断尝试对“秩序”进行规范性界定无果之后，便采用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即承认虽然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并对国际关系研究极为重要，但在内涵上模棱两可且在使用中因人而异。^①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霸权走向低谷后，西方学者对秩序的认识开始重新像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思想界那样，开始变得越发具有进攻性。^②有西方学者更是明确将“自由国际秩序”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联合国与北约这些由国际法与多边条约规制的国际机构”。^③

这种作为绝对状态和永恒自然法的秩序观不但抽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并不关心秩序生成的政治经济基础，更不关心人的能动性在推动秩序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④这种秩序观具有决定论色彩，将等级视为一种自然且无法更改的状态。^⑤它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讨论的受科学主义影响至深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中，也普遍存在于强调历史经验的英国学派甚至许多推崇全球国际关系学方法

^① Muthiah Alagappa,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3–34.

^② 关于美国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保守主义者在越南战争时期面临国内国际社会与经济秩序大动荡时展开的对秩序问题的讨论，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74。两者都将“秩序”视为共同体的第一需求，为人的存在提供了目的与意义。差别在于亨廷顿将政府视为秩序的重要供给者，而柯克将人的精神视为秩序的根基。

^③ 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 “Trump’s Antiliberal Order: How America First Undercuts America’s Advantage,” *Foreign Affairs*, Vol. 104, No. 1, 2025, pp. 16–47;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00–301.

^④ 对于西方国际关系领域内秩序观的梳理与批判，参见李滨：《无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析》，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7期，第4—20页。

^⑤ 王存刚：《时代嬗变与国际秩序更新——基于唯物史观的观察和分析》，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6期，第26—43页。关于等级秩序在欧洲世界秩序观中占据的重要思想位置，参见殷之光：《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43—55页；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第99—113页。

的学者中。^①

对“秩序”概念有理论兴趣的学者基本将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经典定义作为分析起点。^② 在布尔的讨论中，秩序既包含了普遍的自然法特性，也像一个道德哲学的主题，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目的论方向。他将秩序假定为国际政治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呈现出的特定规律，与失序相对。^③ 布尔强调主权国家或是个人在自然状态下呈现出的行为规律不能被视为秩序。秩序不能是人际互动或团体之间互动中展现出的任意一种规律，它必须是一种导向特定结果的规律以及推动特定目的与价值的规律。^④ 秩序需要有明确的目的论指向。布尔引用了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对“秩序”的理解，即诸多天生具有差异的物体“依照它们的本性”遵循上帝的安排并“位于它们应当在那个地方”。^⑤ 在这里，要判断某个物的位置是否“应当”，取决于有能力安排诸多物的主体的意志。简言之，秩序是立法者的目的。

正是这一目的论及其有明确主体性立场的一元论秩序观将奥古斯丁与布尔的思想联系在了一起。两者的关键差别在于，在奥古斯丁那里，唯一具有主体性位置的立法者是上帝，布尔则不得不承认早已世俗化了的人们及其所组成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可能都代表着秩序。^⑥ 但为了不落入相对主义的境地，布尔又从自然法思想传统中寻求帮助，尝试寻找一种统一、本质性、普遍以及穿透时间与空间差异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布尔认为，在实践层面，人们虽然有充分的自由，不按照某种统一的目标去生活。然而，受到“科学法则（scientific law）”的限定，人们的社会行为总会呈现出某种可预测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取决于人类共有的护生、诚信与守财三个基本目的，它们构成了布尔所认为的“社会”。^⑦

（二）英国学派秩序观的霸权起源

布尔将原子化的个人作为理论起点。这种抽象的人与马克思对人作为生活在历

① 囿于篇幅，本文不对英国学派做系统的学术史梳理，而仅关注在英国学派诞生初期几个与秩序讨论密切相关的关键性概念。

② 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29—44页。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Palgrave, 2002, p. xxxiii, p. 3. 另外，柯克也给出了相同的认识。参见 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p. 2.

④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p. 3. 同样的认识还可参见 Stanley Hoffmann,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7, p. 85.

⑤ 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499页。

⑥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p. 4.

⑦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pp. 5—8.

史与自然空间中“现实的人”的认识截然不同，但却与孔德式的世界观内在相通。^① 布尔的国际社会观念直接承继查尔斯·曼宁（C. A. W. Manning）的观点。曼宁将19世纪实证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概念系统性地挪用到对政治组织的分析中。他将民族视为一种“社会整体（social whole）”。^② 组成社会整体的原子化个体各不相同，但被共同的“观念”连接在一起，成为既多样又统一的“星系（constellation）”。这种观念的统一是社会产生共同目的的前提。^③ 对曼宁而言，整合多样性与统一性是“社会整体”概念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他并不满足于将具有差异的原子化个体简单堆叠起来的方案，而是希望各个组成部分能够在共同观念的联合下形成一个实在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不单是“先天存在的血缘、语言或宗教的共同体”，更应当在世界上作为其他尚未获得国族性（nationness）的民族所仰望的榜样。^④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获得国族性而转变为国家，国家之间的互动就组成了国际社会，进而受国际法体系制约。^⑤ 这也说明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研究延续了曼宁的框架，即对社会动力学规律影响下的正式结构（formal-structure）的研究。^⑥

作为19世纪末布尔战争时期出生在南非的白人，曼宁对国际秩序的认识来自英帝国构建的全球秩序出现重大转型的时期。19世纪中期，随着英帝国正式吞并印度，一种建设一个“正式帝国”、将世界统一在英国政府直接治理之下的政治热情不断高涨。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将世界整合起来，建成一个以英国本土为中心，并从伦敦直接领导的世界体系被认为是英国本土度过经济危机的唯一手段。^⑦ 不过，到了19世纪末特别是随着布尔战争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这种“正式帝国”秩序产生怀疑，并将之批评为“帝国主义”。^⑧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联邦

① 关于马克思对“现实的人”概念的阐述，即“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1页。

②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Macmillan Press, 1975, p. 13.

③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15–16.

④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19–20.

⑤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77.

⑥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201.

⑦ Ged Heuma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in Andrew Porter and Alaine Low,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70–494.

⑧ John Darwin, “Imperialism and the Victorians: The Dynamics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2, No. 447, 1997, pp. 614–642; 殷之光：《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第113—128页。

主义的方案，推崇这一方案的知识分子基本来自南非和加拿大等白人殖民地。他们援引亚瑟王传说，将自己推动的帝国改革方案称为“圆桌运动”，希望将英帝国转变为一个“国家的共荣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体系。这个体系以实现了政治自决的白人前殖民地国家为核心，既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对抗德国的扩张主义，也为那些有色人种国家提供了“神圣的委任”。^①

对曼宁而言，由白人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英联邦体系就是一种具有正式结构的国际秩序。将这种国际秩序扩大，就能形成国际社会。^②正如英联邦的实现一样，曼宁坚信“共同意愿（communal willing）”能够推动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③亚非去殖民独立运动与社会主义是曼宁在20世纪中期构想的国际社会中不可忽略的力量，它们不仅为建设国际秩序的探索提供了实践案例，也贡献了重要的理论发展可能。然而在曼宁的秩序构想中，这两者都遭到了明确否定。曼宁将亚非去殖民独立运动视为一种“种族团结（racial solidarity）”。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意愿，虽然“全世界的黑人就像全世界的工人一样，有资格向往共同体的联合”，但是这种联合的实现“距离现实还太遥远”。^④因此，这类人群无法真正获得进入国际社会的资格。而针对当时已经在国家层面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曼宁则从合法性上强调，“领导权”需要在时机成熟之时，即在人们自发形成了真正的公意之后，再“自上而下地被赐予”。^⑤在此基础上，曼宁彻底否定了在既有霸权格局下被压迫国家人民的能动性作用以及被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谋求自主发展斗争的历史意义。

作为英帝国联邦“圆桌运动”改革以及国际联盟体系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者，曼宁构想的国际社会方案将英帝国全球扩张中逐步形成的国际秩序及其理论原则视为准绳，并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亚非反殖民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将殖民地独立视为时机成熟时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先前相互达成信约的结果。曼宁也承认，虽然诸如国际联盟这样的共同安全体系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产物”，但其现阶段的实践却不尽如人意。不过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最具现实意义

① Jeanne Morefield, *Empires Without Imperialism: Anglo-American Decli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fl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99-132.

②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43.

③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46.

④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20.

⑤ 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186-187.

的唯一方案。^①

“国际社会”概念提出时的实践基础是英帝国在 19 世纪末、欧洲在 20 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国际秩序动荡。^② 这种动荡直接表现为帝国与帝国之间、帝国与殖民地之间围绕争夺殖民地垄断经济利益与控制权爆发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作为对这种动荡状态的回应，曼宁等理论家并非简单护持特定国家的霸权，而更像是在帝国全球扩张的进程中殖民地白人精英知识分子对帝国全球扩张中创造的结构权力本身的护持，具体表现为对全球秩序知识体系解释权的重述以及对既有全球体系领导权的争夺。国际社会的正式结构及其社会动力学规律既是这种研究路径关注的对象，也是其研究的目的。

建立在殖民帝国既有的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结构性权力之上的国际社会理论在认识论与实践方式上都没有对既有秩序构成挑战。它将国际社会视为原子化主体间的活动，并用一系列本质化的标准规定了构成原子化主体的条件，承认国际秩序的等级结构对建立“和平的世界共荣联邦”的关键作用，强调强国间通过集体安全遏制违背和平原则的行为。该理论在面对来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独立诉求时，推崇和平解决争端与推动“和平变革”，在面对来自欧洲国家的竞争挑战时则刻画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以及打破“国家孤立”状态、推动国际商贸互动的重要性。^③

五、文化相对主义陷阱：全球国际关系方法与反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困境

（一）多样性实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性的挑战

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出现在 21 世纪。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实践开始挑战理论的普遍性。霸权护持者如何回应这些挑战以及霸权挑战者如何阐释自身是该时期推动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将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这场危机打击了冷战后形成的

^① C. A. W. Manning, “The Future of the Collective System,” in R. B. Mowat, et al., *Anarchy or World Order*,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6, pp. 155-156.

^② David Long, “C. A. W. Manning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und Table*, Vol. 94, No. 1, 2005, pp. 77-96.

^③ W. Arnold-Forster, “The Elements of World Order,” in R. B. Mowat, et al., *Anarchy or World Order*, pp. 19-56.

西方胜利主义情绪，也从根本上冲击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在这种冲击下，欧洲的社会思想力量日益关注全球化本身对欧洲带来的挑战。经济发展乏力一步步蚕食了欧洲知识分子与社会层面上对全球事务中不平等问题的关切，取而代之的是对自身未来越来越强烈的不确定感与担忧。这种担忧随着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中的难民危机变得愈加强烈，并在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达到了顶峰。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的红利逐渐消退，社会不平等状态不断加剧。然而，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大大消解了欧洲社会对全球事务中不平等问题的关切。那种能够触发 2001 年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欧洲大规模反战社会运动的条件一去不返，对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议题的抗议开始盛行。而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不确定状态变得越来越难以分析。这使既有理论工具更加无助于决策者选择政策“最优解”，在过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发展起来的理论与积累的经验同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随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时代所产生的那种国际平衡与民众中的乐观情绪的淡去，欧洲反全球化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等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得利益者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兴起。同时，民粹主义开始在欧美世界获得政治动力，并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埋下了社会基础。此外，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也面临社会经济动荡，由此形成的难民潮更进一步加深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负担与社会不满情绪，反过来又为右翼民粹的社会运动以及理论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发展提供了社会和情绪土壤。这种以基督教自由保守主义为底色的理论潮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漠视自然、只关注当下、没有过去与未来以及消除空间/国界限制的“反文化”。^①

在这种时代浪潮中，欧洲再一次向 19 世纪的自由保守主义寻找思想资源。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不少学者开始意识到，在科学主义这种“美国社会科学”认识论内部无法找到国际关系学科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更无法带领欧洲走出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衰落而产生的不确定困境。与 19 世纪历史大变革时代一样，当前这场大变革的思想影响也表现为对宏大理论与秩序问题的再度关心。^② 来自欧洲

① 帕特里克·德尼恩著，梁乃夫、林泽正译：《自由主义为何失败》，新星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68 页。

② 有研究发现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一个历史关键节点与中外学者对“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及其变迁兴趣极速上升之间的关联。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87—203 页。

等学术中心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开始更深入地追问，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出的宏大理论终结是否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将国际关系学界对宏大理论的淡漠称为一种“理论静谧（theoretical peace）”状态，并在2013年将“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命题以特刊的形式抛给了国际关系学界，尽可能地展现理论多样性。^①

特刊的编者援引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对“理论”这一概念的认识，对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经验主义式的判断。作为一个抽象经验论者，默顿将“理论”视为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和一种受使用者影响的经验性共识。^② 它既可以表示某种微不足道的假定或某种繁复但模糊的推测，也可以表示某种广为人知的公理体系。与帕森斯的宏大叙事不同，默顿的经验主义将世界切碎，并还原成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具有相对主义特点的认识论虽然通过“结构”这个概念为分析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组织提供了位置，又用“行动”为分析主体性在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抓手，但这种分析框架仍未超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将社会结构与个人这种行动者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原子化分析单位。在原子论世界观影响下，经验主义虽然对美国国际关系科学主义的霸权提出了有意义的批判，并将“宏大理论”视为一种“哲学贫困”以及淡漠欧洲思想史丰富传统的结果，^③ 然而这种批判并未在认识论层面上提供任何有超越性的创见，唯一的方案是通过重新引入历史学提供的时间维度以及经验主义的案例——并且仍旧还是以西方历史经验为中心的案例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以及潜在地通过突出经验多样性来实现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提了出来。这也与欧洲在现象学影响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产生了共鸣。

与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美国社会学研究不同，《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特刊作者的理论探索将世界缩减成了一种纯粹意识的存在。这并非本文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本意，但由于多样性被理解成不同主体活动的经验性结果，而原子化的个人又是经验主义分析的最小主体，那么国家与国际组织等一系列原本被天然接纳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对象便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个自我消解的尴尬境地。“国际行为的主体究竟是什么”

^①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05-425.

^② Robert K. Merton,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Five Essays, Old and New*, The Free Press, 1967, p. 39.

^③ Chris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83-497.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梳理与回顾了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成果。

这一问题挑战了国际关系传统的研究对象，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问哪些因素会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影响。当研究对象变得难以被确定之后，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便更加无关紧要了。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的讨论客观上展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局限，也正是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当旧的理论显得局促不安时，一种新的理论可能性才得以产生。

（二）相对主义对普遍性的否定及其内在矛盾

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展现的多样性还面临着另一种尴尬处境，即这种对理论多样性的探索将作为意识存在的世界与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世界割裂开来。在这条思想脉络中出现的全球国际关系学路径将理论的多样性推向了全球层面。全球国际关系路径从后殖民理论中汲取了灵感，对启蒙特别是启蒙背后的科学主义态度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启蒙压制了世界的多样性，并为欧洲帝国主义提供了合法性。^① 在这种思潮中，任何普遍性都可能会被作为霸权而遭到批判与否定。同时，他们也重复了19世纪将物质（科学主义）与灵魂/意识（历史主义）的二元对立，通过回归历史主义的方法否定物质性，将世界的多元性建立在精神性之上。^② 他们还将此类观点同批判主义理论结合，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出发构想了一种原子化、不同主体、互不关联与精神性的抽象平等，认为新的普遍性应当是一种“在变化的世界中理解与尊重普遍性”。^③ 他们经常援引“世界图景（world-pictures）”这个现象学中经常被提及的意向来形容理论的多样性。这批学者将世界视作一种“认知经验（perceptual experience）”，一种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应。通过将“世界”转化为主观化经验，全球国际关系路径与批判理论一起，为来自伊斯兰世界、中国古代以及非洲等非西方世界的经验提供了形式上被理论化的空间。^④ 这些经验就像是陈列在世界这个巨大博物馆中的一幅幅图像。主导这类多样的普遍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就是一种抽象的交往理性。理想化的理论多样性图景忽略了一种现实存在的霸权结构，它并不能解答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是在制度还是思想层面，仍旧是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普遍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关系紧密的国际秩序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同时它也无法回答，在意识层面

^① Sankar Muthu,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6.

^②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2014, pp. 647-659.

^③ Robert W. Cox, "Universalit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Historicist Approach,"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209-216.

^④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647-659.

普遍存在的多样性又如何能够在现实层面上真正成为人们在世界上进行实践的主导性原则。由于其在认识论上对普遍主义的否定，它从根基上便将整体性哲学特别是有政治实践愿望的整体性哲学排除在外。

从经验主义出发展开的理论建构也呼应了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的一些学者给出的经典论断，即“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①毫无疑问，这类讨论帮助我们解构了西方宏大理论普遍性背后的霸权，也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问题放入知识生产的讨论中。然而，经验主义虽然为多样性提供了理论空间，但并未解决 21 世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衰败后国际秩序将向何处去这一根本的目的论问题。目的论探索的缺失加上过去近一百年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政治实践的系统性排斥，又反过来进一步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在 19 世纪认识论框架中打转的状态。在抽离了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唯物辩证法以及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之后，横亘在自然科学与“道德/历史科学”之间、在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之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则更像是在自然科学与“道德/历史科学”二分困境中震荡的结果。对秩序的认识为我们解释这种震荡提供了思想的切入点。

（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反相对主义基础

伴随着理论探索的迟滞，国际关系学科还面临着此起彼伏的现实挑战。作为一种旨在解释人类跨国活动客观规律的学科，国际关系既有理论的解释力不断遭到各式各样“紧急事件”和“例外状态”的冲击。甚至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内部，一种对本学科逐渐失能的隐忧也日渐明显。^②造成这种失能状态的原因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之外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现状发展的系统性忽视。^③在 21 世纪头十年间，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还能够通过引入后殖民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来补充理论的疲态，为非西方历史与思想资源提供了某种理论位置。在“非西方”这一“西方”的他者化概念中，为“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等范畴找到了一

^①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81, pp. 126–155.

^② Phillip Darby, “A Disabling Discipline?”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4–95.

^③ 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8 期，第 99—113 页。

定空间,发展出了全球性国际关系学路径。^①然而,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景象未能真正解决国际关系总体理论发展的迟滞感。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面临的困境在于其日渐动摇的目的论基础。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都意识到,根据传统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指导并按照其面目塑造世界的实践越发艰难。而退到纯理论讨论中的批判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者更是不断面临着对其改变现实能力的质疑。^②

这种质疑不单是学理上的批判,更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经验断裂的自然反应。一方面,这种断裂表现为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在处理国际秩序问题时感受到的理论匮乏。全球性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经验的复数属性,这种形式上的多元化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过“世界市场”概念强调的不平等结构。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全球尺度上的不平等结构是现实存在的,也是所有人与国家谋求现实平等的历史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思想文化与历史经验上的多元如果不同现实中的不平等结构结合起来,那么纯粹对精神多样性的声张便无法转化为实现社会共和国这一政治实践的追求。中国对知识自主性的诉求便是对这种匮乏的反应。另一方面,不同群体、地区和国家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全球化的结构性压力、区域性的战争暴力、文化的霸权以及发展的不平等,理论在直面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如何处理这一尴尬的境地,是与现实经验紧密结合的国际关系学科不得不回应的重要问题。

当理论诉求与中国以及与中国所处的这个时空发生共振时,就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有意义,是中国用来解释自身国内国际行为的根本理由,也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今天的中国已经全球“在场(present)”,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世界性。这也意味着中国开始有能力在全球这一尺度上活动,并作为能动的一员思考和实践全球秩序问题。那么中国如何突破过去数百年间形成并延续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组织模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

^① Stephanie Neuman,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Macmillan, 1998; Siba Grovogu, “A Revolution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Vol. 5, No. 1, 2011, pp. 175–190;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287–312;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Routledge, 2010; 任晓:《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义》,载《学术界》,2025年第3期,第18—26页。

^② Michael Barnett and Ayşe Zarakol,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ssentialism Trap,”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5, No. 3, 2023, pp. 428–444.

员从现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的“边缘”和“底端”视角出发，去构建一个能够避免垄断、包容多元的真正平等的秩序？此外，如何认识这一获得了世界性的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中国的快速发展，更是不同共同体如何放置（positioning）自身且期待怎样的未来时所面临的历史客观条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塑造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系统性知识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诉求，也是一个全球性议题。

六、共同体的辩证法：总体性视角下的中国及其自主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知识自主性的认识论基础

中国世界性在全球化时代的获得是我们讨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物质前提。理解这种秩序观与前文讨论的19世纪认识论有哪些关键的差别、又有何种内在联系，是讨论今天中国知识自主性的认识论基础。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是，中国接续了被西方理论界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19世纪欧洲整体主义思想发展的产物之一，马克思主义以欧洲科学发展带来的自然哲学成果为基础，调和了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鸿沟。中国传统中的整体主义与辩证法思维则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当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这种秩序观通过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来理解国际社会秩序演变的状态与趋势，通过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将“共同意愿”转化为面向现实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且以“实现现代化”为基础将人在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时间序列上连接了起来。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并不排除实证主义带来的成果，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实证主义的边界。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实证主义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应用时的关系？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与伊壁鸠鲁（Epicurus）的比较阐发中得到启发。通过重新发现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对运动规律本身的关注，马克思将人的能动性带回到对历史哲学的讨论中，摆脱了机械唯物论在解释一切事物的发生、繁荣和衰亡时所面临的决定论困境以及循环往复的历史观。^① 马克思在对德谟克利特的批判中，展现了将事物本身以及人的意识放回到其存在的语境中的必要性。他指出，“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② 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3页。

克思并未否定原子的意义，但他将原子视为“一般的、经验的自然研究的普遍的客观的表现”。^①既然运动是所有事物的必然属性，那么抽离运动来理解一个抽象、特殊的原子则并不能完全展现其本质。这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表述为“每一个物体，就它处在下落运动中来看，不外是一个运动着的点，并且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点，一个在某种定在中——即在它自己所划出的直线中——丧失了个别性的点”。^②

“点在线中被扬弃”的表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讨论中面临的宏大尺度上的秩序及其变迁的问题。毫无疑问，将每一个行为体作为组成国际秩序的原子，单独去理解行为体本身或原子化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形式逻辑的法则理解行为体在具体事件上的行动。但当我们尝试用这些原子化行为体的堆叠来理解作为整体的秩序变迁时，便会面临“点在线中被扬弃”的问题。这时，辩证逻辑能够提供解释秩序整体性变迁的可能。与那种将世界视为微小原子堆砌的自然观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将运动本身视为构成世界的根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人类活动视为行动（经验性的）与知识（理论性的）的时间性积累与空间性积累。受到自然与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类活动得以在不同尺度上展开。由不同人类活动而构成的家庭、宗族、社群、行会、党派、公司、机构和国家等规模不同、功能各异共同体同样也能够作为行为体参与到人类活动中。秩序则是不同行为体在不同尺度的共同体内表达出的集体行为。同时，人类活动无法在自然/物质世界之外发生，并且这种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物质世界进行着持续改造，经由人类活动而改造了的物质世界又反过来为新一代人类的活动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这种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连续堆叠又构成了秩序的又一种特质，即自然世界与人的生活历史性的交织。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始终对决定论的霸权特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这种决定论视为“资产阶级宣传家”的思想。在对意大利南部发展问题的讨论中，葛兰西提出南方被描述为制约意大利社会发展的“锁链”，这种描述强调，南方不能进步是因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的落后与“资本主义制度或其他历史原因”无关，而是“自然环境”使得“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2页。

和野蛮”。^① 这种决定论直到今天仍旧以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名义继续存在，从静态而非运动的视角以机械唯物论创造的必然性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界始终对这种认识论的实证主义保持审慎，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应当是“以人为核心的研究，其终极关怀也应该是人”。^② 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也促生了对历史主义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路径的创新实践。谋求一种“中国学者发展构建且经过验证的有关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追求。^③

（二）“全球南方”作为一种“运动”的范畴及其对霸权“治序”的消解

试图抽离运动去理解制度的本质往往显示出一种维护结构性权力地位的企图。这也使得本应当为人类历史发展与秩序变迁提供趋势性分析的国际关系研究变得像是一种对治理术的阐释学。近些年主流西方政策话语体系越发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进而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带入一种“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境地之中。这种“神秘主义”的秩序观在理解中国以及“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西方政策界在审视“全球南方”的兴起时，仅仅表浅地注意到了“全球南方”在对华与对西方立场上分歧日益加深的现象，将之单纯视为“自由与非自由势力范围（liberal and illiberal spheres）”之间的固有冲突，^④ 并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与 20 世纪中期英国学派对秩序问题的讨论不同，当今美国学者在面对秩序变迁时更明显地表现出了美国霸权中心主义的特点。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地位的舒适性建立在对国际多种权力的垄断及其所带来的安全感之上。但这种安全感与失去垄断的恐慌感同时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隐藏在这种舒适感与恐慌感的二律背反中。这种二律背反的关系也进一步造成了其政策的震荡。当英国学派那些来自帝国“边缘”的白人学者探索秩序问题时，他们对秩序稳定的追求不再寄托于制度化的英帝国上。正因如此，他们才得以在联邦

① 《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9—230 页。

② 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 期，第 20 页。此外，李炳霖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对实证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影响以及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参见李炳霖：《国际关系思想史视阈中的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吉林大学 2024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自 2023 年以来，《复旦国际关系评论》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系统性讨论。参见陈拯、郑宇主编：《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三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7 页。

④ Roberto S. Foa, et al., “A World Divided: Russia, China and the West,”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2022.

的制度基础上去构想一个国际社会。虽然这个国际社会潜在的准入条件与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少国际社会的概念相比帝国的直接统治来说为包容与平等的国际秩序理想追求提供了潜在的理论发展空间。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干涉以及推动他国进行政治经济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手段，在事实上建立起了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①这种帝国式的秩序理想同时与美国自身的经济野心密切关联。美国的对外政策无论是扩张政策还是保护主义，都与本土的经济诉求密切相连，^②这就使得美国对世界领导权的追求表现得更像是欧洲历史经验中的“直接帝国”。而正如英帝国的历史经验，美国建设直接帝国的经验也被长期不断的海外战争以及沉重不堪的安全负担所拖累。在2008年这个关键节点前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与知识分子开始对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感到疲倦。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直接帝国也在疲态中迎来了它不可避免的衰落。^③

实际上，如果对西方在历史上建构的国际秩序体系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便不难发现这类秩序构想与建设实践基本没有脱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基于希腊城邦政治经验给出的基本政体分类。世界秩序被想象成带有明显等级差别的共主共同体。规则制定的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且存在明确规则制定者与被管理者角色二分的结构。国际秩序的形成是由大国主导制定规则并积极推行、其他国家被迫或自愿遵从规则的结果。世界秩序像是一种具有寡头甚至君主制色彩的政治结构。对秩序的研究由此变成对这种寡头结构内部“治序”的探索。在这个目的论上，具有浓厚科学主义决定论色彩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同引入了历史分析维度的英国学派保持了一致。我们将“位置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中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这种“治序”研究更多反映了结构性权力护持者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性霸权的中心对这种结构进行改良性或辩护性论述。对这类研究最具建设性的批判则需要我们对霸权结构本身进行讨论。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构想一种不同于西方共主共同体元命题想象的共同体秩序。

（三）从辩证法出发来理论化“全球南方”

对“全球南方”历史经验的讨论与理论化，并不是要像全球国际关系学路径那

① Harry 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p. 91.

② 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 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 pp. 80-81.

③ A. G. Hopkins, *American Empire, A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707-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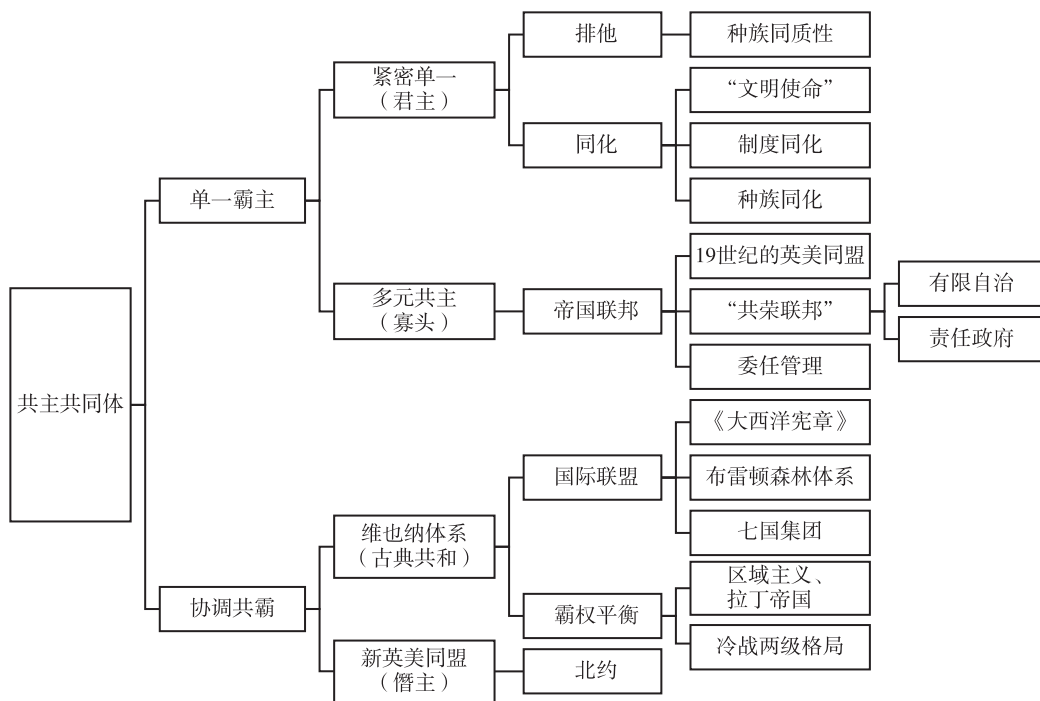


图2 西方国际秩序构想的基本类型与实践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样用新康德主义式的历史主义来否定科学主义，也不能从科学主义传统内部出发，将“全球南方”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参与共主共同体霸权竞争的一极。^① 我们需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并考虑中国与整个“全球南方”在“世界市场”构成的历史进程中所共有的位置性特点，进而思考人类整体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的新路径。在这里，世界市场的整体性是我们思考“全球南方”现代化问题的基本前提。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第三世界与“全球南方”无法摆脱全球化以及世界市场中既有的结构性不平等来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更何况“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本身就是这种结构性霸权的直接产物。因此，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状态，将“殖民现代化”的产物改造成“全球南方”自主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并进一步推动现有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就成为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的普遍性问题，也是知识自主性的

^① 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第99—113页。

基础。

在处理自主性问题的時候，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就是回答自主性是否意味着排他。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2007年最早开始讨论“全球南方”问题时便注意到了这个潜在的问题。他担忧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在“全球南方”中经济发展表现优秀的国家可能会陷入“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的局面。^① 德里克的考量基于一定时代背景，因为就在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与高盛银行分析师约书亚·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抛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即“北京共识”，认为基于中国发展经验而形成的“北京共识”终将取代“华盛顿共识”，领导世界经济发展。^②

尽管如此，德里克仍旧注意到，虽然“北京共识”从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部诞生，但似乎很快便“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开始成为一种共同意愿，在深受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冲击的亚洲国家以及其他谋求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了广泛共鸣，传递了“全球南方”国家迫切希望谋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替代方案的共识，并与20世纪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产生了历史性共振。当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在秩序构想与制度建设上明确接续了第三世界运动。在拥抱了从新自由主义秩序中产生的“金砖国家”概念后，“全球南方”国家也将这一概念放置在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的连续进程中。^③

恰是在这种整体性的视角中，“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概念产生了有机联系，并成为—个全球所有民族与国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底部的人民谋求平等与自主发展的共同意志。而在这个谋求平等共同意志的基础上，自主并不意味着排他，而是对同一个秩序理想的“在地化（localization）”，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逻辑的现实态度。^④

（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普遍理论与在地经验的辩证

这种普遍性与在地化的辩证在中国现代国际秩序研究的脉络中始终存在。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以“改造中国与世界”来描述这

①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Vol. 1, No. 1, 2007, pp. 12-23.

②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London, 2004.

③ “Revisiting the 1955 Bandung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nd Its Legacy,” <https://www.southcentre.int/question/revisiting-the-1955-bandung-asian-african-conference-and-its-legacy/>.

④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p. 20.

种辩证的实在目的。其普遍意义体现在其对改造世界这个指向未来的长远目标上，改造中国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下手处”。仅仅改造中国而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改造比为狭义，必将妨碍世界”。^① 1920年毛泽东给周世钊的通信中更是表达出了这种普遍关怀明确的“位置性”，即“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同时，他强调为了解中国，必须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② 中国的自我解放必须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③ 他曾经将这种秩序理想称为“世界主义”，并与殖民主义进行了对照：前者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是“愿大家好的主义”；后者则是“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是“损人利己的政策”。而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世界大同”，则“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④ 这种世界秩序观明确体现在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中并延续至今。在2024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也在民族独立运动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关系中，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的世界秩序观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1974年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联系在一起，描述了一个从亚洲特殊历史条件中诞生的国际秩序原则，在“全球南方”整体性谋求独立自主的运动中获得了普遍性与“走向世界”的图景。^⑤ 这一图景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社会共和国”秩序观在“世界市场”中的延伸。

对位置性的明确意识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与国际政治实践的一贯特性。1934年《世界知识》创刊辞中就强调，中国进行国际研究的目的是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的征途上”，帮助所有人认识世界。这一世界的基础是“资本帝国主义”创造的“文明世界”，无法摆脱其内部因谋求垄断利益而产生的“极端的国家主义、黠武主义”以及在经济上的“锁国主义”和“货币关税的战争”。这种自生的战争暴力不但对一切殖民地弱小民族造成了压迫，也彻底导致“文明世界”普遍理想的动摇。因此，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向“文明世界”的反抗，谋求“合力征服自然，提高生活水准的斗争”中，“平等自由作栋梁”的世界秩序理想才真正得以接续。在这个进程中，所有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等“资本帝国主义贪欲的最后目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第45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第503页。

⑤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

物”成为这种不平等秩序倒塌而世界秩序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①

实际上，现代中国始终在一个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思考并表述秩序观问题。“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②则是这种辩证视角下对世界秩序及自身未来发展的基本认识。更进一步，在2024年10月24日的“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视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③同时，这种群体性崛起还与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即全球探索“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不懈努力。^④在这个人类共同的理想与实践进程中，中国以及所有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进程中“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将平等与发展问题作为一组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推向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前台，并通过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制度性平台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步的深刻思考的五项原则，经由反帝、反殖、反霸的不懈行动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财富，并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⑤

这一系列表述将国际秩序的变革性、群体性和历史性三个关键概念带入到对“全球南方”问题以及中国自我秩序观的认识中。其中，群体性与历史性分别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带到了对国际秩序这一命题的分析中。这种历史哲学对过去的回望是立足现在并指向未来的。同时，“变革”这一关键词更明确地传达了中国将世界秩序视为一种不断变化发展动态的基本认识。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辩证思维与逻辑理解这种动态，发掘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迈向现代化这一目标，便构成了中国现代国际秩序观的认识论基础。

① 《创刊辞》，载《世界知识》，1934年第1期，第1—3页。

② 《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13日。

③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

④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

⑤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

对中国而言，国际秩序的变革包含了两个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第一，国际秩序需要从整体性视角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在作为复杂有机整体的世界中，理解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变革”这一关键词需要我们关注动态，而不是从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动态简化成一个个静态片段的叠加。实际上，群体性与历史性的视角提出了秩序认知的主体性与目的论。在明确了目的论之后，作为集合名词的人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便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范畴。对于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来说，谋求现代化与国际的平等秩序便是这个绵延几代人、持续不断的现实诉求。在这个谋求法律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既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也是“全球南方”在世界性的霸权结构中保卫和平与自主发展权的重要力量。

七、结论：面向未来的理论

辩证法为回答“什么是中国的秩序观”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认识论。这一认识论以运动为根本特性，关注主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并将主体的运动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中理解。这种秩序观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解放为目的论，以建设一种真正的社会共和国为国际秩序理想，以尊重形式平等、谋求实质平等为现实抓手。在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间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① 这一认识展现了与机械唯物论和历史主义截然不同的秩序观。在政策上，这种秩序观表现为中国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充分考虑自然、时代、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条件的影响，灵活主动地调整方法，谋求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在现代化这项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运动中，人不再被客观条件所决定，而是在与客观条件的互动中不断地实现着主观能动性。这种运动必须在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基础上才能显现出其面向未来和解放的意义。这在共时的维度上体现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整体性认识，^② 在当前则表达为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南方”整体性发展的关联。实际上，作为曾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中的被压迫者，中国从被压迫位置走到今天的历史恰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69页。这应当是毛泽东用“国际主义”替换“世界主义”较早的文本案例。

展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将中国的和平发展放在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的整体关系中，中国的发展便获得了普遍性。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是一种特殊性现象，而是作为曾经在“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中底端的一员通过能动的实践不断朝向实质性平等的历史进程。这对所有处于不平等结构底端的“全球南方”、对广大有着“去依附”发展理想的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历史辩证法最终必然使南北经济关系消失。”^① 陈其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南北经济关系研究》一文。的确，面向解放的发展是“全球南方”乃至人类整体的一项长远志业。在这项漫长的志业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回答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现代化理论均未能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既实现生产力的进步又能消除不平等、如何保障真正的自由？中国没有盲从经典现代化理论非小政府不可的刻板迷思，而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更积极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中国也没有完全陷于左翼现代化理论对国际分工的悲观拒斥，而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开放的胸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以负责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②

以实现广大被压迫者现代化为目标的秩序观还将人在历时的序列上连接起来。这种历时性的联系让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段的脉络中展开对秩序的运动的讨论。这种历时性的联系具有超验的特点，但与西方建立在抽象意志基础上的超验性不同，这种建立在现世实践基础上的超验性将一代代人的努力连接了起来。毛泽东用《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故事解释了这种基于现世的超验性。在“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时间延续中，平等与解放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到来。^③ 同时，作为一种基于现世的历史哲学，这种超验性的获得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的过程中，站在此刻的时间点上对历史进行回望，并为过去的实践赋予意义。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上的描述那样，只有站在新中国这一历史时刻向上追溯，一代代人运动与牺牲的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也只有在这种历史哲学的绵延中，我们才能理解面向解放的乐观主义态度的唯物主义基础。

(截稿：2025年2月 责任编辑：郭 泉)

① 《陈其人文集》(第7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56页。

② 陈明明：《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第3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Abstracts

Towards the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The Ontology of Order and Its Com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YIN Zhiguang (3)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modern Western IR theorie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European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prompted European thinkers to engage in systematic, universal, and global-scale reflections on order. Within this intellectual milieu, three distinc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emerged: Marxism,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Among these, Marxism furnished a dialectical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dynamic order, conceptualizing it as a projection of a pattern of collective movements shaped by diverse actors across communities with varying scales. These collective movements continuously transform the material world, while the altered material conditions, in turn, expand the terrain for subsequent human agency. This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f cumulative layering constitutes another defining feature of order: the historically entangled synthesis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human social lif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rxist tradition, particularly its holistic methodology, precipitated the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between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rendering integrative concepts like the Global South inadequately theorized. Isolated applications of either tradition have further hindered the systematic theorization of China's conception of order. In contrast,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offers a rigorous holistic epistemology and establishes a univers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nterpreting modern China's order paradigm. China's political praxis has inherited this epistemology and amid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pen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advancing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ist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 South, epistemological autonomy, scientism

【Author】 YIN Zhiguang,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